

杨宏海
著

客邑人文
追寻客家文化的历史意蕴
月照围楼
文化学者的诗意情怀
编外钩沉
意犹未尽的吉光片羽

woyu
shenzhenwenhua
yigerenyu
yizuochengshide
wenhuashi

一个人
与一座城市
的文化史

文化深圳
“特区文化”的前世今生
都市百态
移民新城的文学景观
打工文学
草根阶层的心灵呐喊
阳光写作
青春文学的横空出世
创意无限
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我与深圳文化



上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杨宏海
✧ 著

我与深圳文化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

上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与深圳文化：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 / 杨宏海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360-6126-2

I. ①我… II. ①杨… III. ①城市文化—研究—深圳市 IV. ①G12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7594号

责任编辑：詹秀敏 余红梅
封面题字：刘斯奋
版式设计：花季雨季
封面设计：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72.75 26插页
字 数 1,300,000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8.00元(上、下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一：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

黄树森

闻讯宏海的自选集《我与深圳文化》将出版，心甚欣慰。

跟宏海的“忘年之谊”可追溯至30年前。1984年，我主持的广东省作家协会《当代文坛报》在广州举办讲习班，宏海以嘉应学院一名青年教师的身份位列其中，恰而立之年，风华正茂，正是人生最有梦想的时候。其时，我邀著名武侠小说宗师梁羽生先生到穗讲学，随后我陪梁先生到深圳特区参观、考察、开讲座，宏海一路追随，充当“文化义工”，其人其事之生动，至今历历在目，而此次特区之行亦为宏海之后投身深圳文化建设播下了一颗种子。

论家世，宏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为一代名医，父亲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国政系，写得一手好诗词文章，名副其实的诗礼之家。既承家学渊源，身为长子的宏海自然被寄予无限期许，得以身受严格的家教，打小就培养出对文学和学术的浓厚兴趣。

“文革”期间，宏海因父亲曾被划为“右派”的关系，成了典型的“黑五类”，不久就被下放至农村当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期间还一度被安排到“最艰苦的地方”——小煤矿去接受“再教育”。虽是往事不堪回首，但这段矿工生活，却让宏海切切实实地与广大社会底层民众“无缝接触”，完全拓宽了他对生活、对社会、对文化的视野与认知。事实上，此段人生经验为他日后在深圳首倡并推动“打工文学”埋下了重要伏笔——有些“打工作家”曾质疑杨宏海此种倡导是否仅为一种策略或者“做姿态”，一旦了解宏海青年时代的这段经历，便疑

惑顿消，转而生发一种“曾经共同经历”的高度信任与心灵共鸣。

宏海乐观向上的品格，在他下放煤矿挖煤时期显露无遗。他凭借广博的知识以及在表演方面的天分和才华，迅速从“黑压压”的工人群众中脱颖而出，成为“熠熠生辉”的文艺骨干；表演之余，他还迅速将触角伸向创作环节，创作了一批“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不少还被推荐到县（区）参加文艺汇演，并屡次获奖。这些文艺实践，亦为他日后创作重量级作品《祖国，深圳对你说》、《月照围楼》等优秀舞台剧目做了良好的准备。

回城后，恢复高考第一年，宏海顺利考入嘉应学院中文系。大学，对于求学、求知欲甚炽的宏海犹如“雪中之炭”：几年时间，宏海在知识的殿堂中流连忘返；除中文系学科，还对数门人文、社科知识“旁逸斜出”，刻苦研读；亦在此时，这个年轻人开始朦朦胧胧地探索与寻找自己人生事业的方向。

求学期间，宏海自发地表现出对客家文化的强烈兴趣。在中国百废待兴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主流学术界忙于“超英赶美”，对各种西方理论与方法“生吞活剥”；区域民俗、民间文化研究属于绝对冷门，探者甚微。而恰恰是这方偏僻的梅州小城，出了宏海这样一名自觉选择“坐冷板凳”的青年学者，越发显示其深植本土、深耕民间的文化视野与人文价值观。也许，宏海正是那个“天将降大任”之“斯人”，他“被选择”，成为客家民系文化“薪火相传”的那把“火”、那簇“薪”，我想，这也许是宏海命运冥冥中的必然。

大学毕业时的就业选择再一次显示宏海对人生事业的追求与坚持。毕业前梅州的报社与政府文化部门已向宏海伸出橄榄枝，应当说，以其家世人脉以及其自身优势，他完全可以选择当时最热门、最具诱惑力的媒体或政府文化部门等岗位，但他偏偏作出一个让众人瞠目的决定——留校任教。众人对他的“自甘落寞”颇不解，但宏海有他自己坚持的理由，他的心，已然被文化、学术所独有的魅力深深吸引。未几，任中文系当代文学教师的宏海，利用其兼职校报副总编之便，创办了一份《客家民俗报》（此系中国大陆新时期首份客家文化研究报刊），并着手展开对黄遵宪、丘逢甲、李金发等客家“闻达乡贤”的研究：其中《黄遵宪与中国民俗学》一文，得到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著名近代文学研究专家管林先生，中央民族学院民俗学教授杨成志先生的高度好评，并被推荐至《中国文化研究》发表，赢得学界一片掌声，受到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重视。其后，宏海在深圳工作期间，也因其对民俗民间文化研究所取得的实绩，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推荐，以“后进”、“新晋”之才，出席北京第五届全国文代会。

宏海与深圳结缘，事关前文所述的梁羽生先生。犹记抵深当天，为逃避城管人员的阻拦，我、宏海与廖红球（现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三人半夜出动，宏海和红球提着糍糊筒，我抱一堆讲座海报，在特区大街小巷四处张贴。鲜动灵活地道出此景，绝非仅为讲述宏海和红球这两名广东文化界“一方诸侯”的奇闻轶事；更重要的，从那次与宏海的交往间，我清晰地感知到他性格中的另一面——在其才情之外所透露出的坚韧、刚毅、不畏艰苦、不怕挫折、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其温和、儒雅、冷静之下，骨子里激情和浪漫的因子。我当时就断言，这个年轻人未必会止于书斋，在他心中，自有更宏远的梦想和更深广的抱负。

次年，宏海调到深圳。虽不甚明了他当时的心路历程，但对这个选择，我是高兴的。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许多“不安分”的大学青年教师，纷纷跳出学校。与宏海心中的世界相比，梅州这方天地显得相对闭塞，一旦感受到朝气蓬勃的特区气息，他便开始追逐梦想，重新选择，我以为这种选择是对的。宏海调至深圳文化局履职8年，尔后便创办并主持了特色鲜明的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更有10年任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期间他足称全程参与深圳文化建设的开拓发展，参与了影响特区进程的重要文化实践。

宏海为人温文尔雅，与之交往如沐春风。他甚少与人争辩，更少给人难堪。因有充足的学养，他看问题不走极端，大处着眼，细处入手，注重史料和证据，文章更是厚重平实，绝不摆花架子。我至今认为，宏海其人，的确是——而且首先是做学问的料子，正因如此，他才在任职多项特区文化建设重要社会职务期间还不断“生产创造”出文化、文学、民俗等多项研究成果，著述颇丰。

我曾尝试概括宏海在特区乃至中国不同人文领域的研究贡献，发现他涉略面广，且颇有开先河之创新实践。如他以政府文化工作者的姿态，开创“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融政府与专家视野为一体；如他首提深圳“现代文化名城”定位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城市方略、参与首倡“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等市民文化公众活动；如他率先对“华侨城”旅游文化进行调研，撰文总结经验；率先推动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率先扛起“打工文学”、“阳光写作”等文学新类别旗帜；他又以学者的视野，悉心钻研客家文化与深圳“新移民都市文化”；他还亲手主创舞台剧《月照围楼》……凡此种种，不复赘述。

初识宏海者，都为他视野之阔、领域之宽、钻研之深而折服，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累累硕果的背后，是他对深圳以至中国当代文化事业勤奋的思考与钻研。宏海其所亲历的诸项文化活动，大部分与深圳这座新兴城市短短30年的文化史上重要事件重叠，虽谓时代与历史的选择，却与其个人旨趣、学养、抱

负与致力密不可分。可以说，经过近三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努力，杨宏海在文化学、文学、民俗学、“客家学”等不同人文领域创建了十几项“第一”，均具新领域开拓意义与价值，可称为深圳文化的“活字典”和“百科全书”。作为学者，其可贵处在资料占有和理论应用间找到了至佳平衡点，勾勒出深圳文化发展的一条薪火相续的脉线，具有深圳文化“奠基”之意与“窗口”之用。

我想重点阐述一下宏海所倡导的“打工文学”，其所代表的，是深圳这座城市文化的良心。就“打工文学”而言，我深信国内无人比宏海更有发言权；早于上世纪80年代，宏海在一篇名为《关注打工群体的文化权益》的文章中就写到：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当年流行于深圳的口头禅，对打工者而言，其间却含着多少辛酸的故事和难言的无奈！他意味着匆匆上班——打卡；匆匆下班——吃饭，整天在流水线上作业，身心极度疲乏。在紧张而艰苦的劳动与工作之外，他们需要寻找娱乐活动以松弛紧张的神经，充实远离家门后孤寂的心灵；他们渴望得到优秀的文化教育和熏陶，以丰富提升自己，追求更有价值的生存；他们向往真善美，向往人文和科学知识，希望通过文化活动和文化参与，了解社会和人生。然而，面对影剧院、书店、公园的奇缺，他们无处驻足；面对消费昂贵的歌舞厅、卡拉OK、大片，他们囊中羞涩不敢问津。”

此系我所认识的宏海：传统知识分子的品行，敏锐善感的触角，浓郁的人文情怀，强烈的社会文化意识。其后，宏海于“打工文学”倾注了满腔热情，发现并扶持了大批有潜质、有创造力的草根作者群，令“打工文学”成为这座新兴城市独有的文学类别与“标签”。“打工文学”及其作者群广受文艺界关注，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已经远远超越文学本身。

宏海是一个勤于反思、具有强烈社会文化责任感的学者。他甚早就意识到，现行体制正在急剧地加速城乡差别，城市人群与“打工者”在文化背景共识上的差异，将愈来愈大。“打工者”面对陌生的现代城市文明表现出“文化饥渴”，他们需要的不是单纯文艺娱乐，他们迫切地需要各类知识，需要对城市文明最起码的了解与认知，需要享有更多的文化权益。在此意义上，宏海呼吁、扶持“打工文学”，意义已然延伸到更深远的层面——基层打工者的“国民文化待遇”问题。宏海指出，“外来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既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但“外来工”作为日益庞大的新弱势群体，其权益保障缺失已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与之在平等就业权、生命健康权、劳动报酬权、民主参与权、子女受教育权等问题上所受的困扰相比，文化权益的被漠视也非常突出。宏海严肃提出，仅将文化

当作精神文明建设的“工程”来抓，远远不够；更应将文化视为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共同富裕的根本手段。如果整个社会不关心“外来打工者”的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活，不关心他们“进城后”人生价值观的重建，在传统伦理萎缩，现代价值又无法及时建立起来的境况中，就难免被各种其他力量（如邪恶势力）所左右。在更高层面看，当外来工整体的人生价值和道德伦理处于含混、不确定时，社会的整体道德价值体系就将从基层开始，陷入混乱无序，势必成为“现代化中国”潜在的最大危机。从这一角度，宏海关注并培育、扶植、引导从打工群体中结胎、孕育、萌生、壮大的打工文学，是一种更大的社会责任担当，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意义深远。

如果说，“打工文学”命题显示宏海“铁肩担道义”；那么，在学术研究领域，宏海堪称“妙手著文章”，并且，他选择了一条艰辛却坚实、严肃且严谨的治学、为文之道路。宏海之为学为文，始终坚持大量原始资料的搜寻阅读、切实的田野调查与独到的理论发现、应用，三个维度，交汇相融。源于自觉的治史意识，宏海将传统文史之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化研究领域，致力于构建一套科学化、体系化的学术规范，为深圳文化做历史脉络的梳理与总结。他既敏于汲取西方现代学术理论，又善于因承“科学古典主义”（梁启超语）的方法和精神；他既坚持艰苦的第一手资料、素材的收集探赜，又勇于葆有活跃的理论思考空间。正如他对深圳历史沿革、地域文化、30年间文化发展的考察、研究与推动：很多资料或近乎湮没，或鲜为人知，因由他的发现、再整理而焕发生机，从而收集保存了这座移民新城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让读者从中可以触摸和把握深圳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

针对深圳移民新城特有的多元文化共生的文化发展趋势，宏海始终保持一种平等宽容的态度：在反对“文化中心论”的同时，力求发现特区“新质文化”、“边缘文化”的特色；在探求文化发展中的问题时，既能做到雅俗互又致补，力于文化的历史传承与现实创造相统一。宏海于追踪生机盎然的深圳特区文化实践过程中，以翔实之数据、动态之眼光、科学之态度，概括特区文化多元兼容、雅俗趋同、与时俱进的特征，勉力探究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我观此等贡献，绝不限于深圳这个城市的文化建设、文化产业的发展等环节，更涉及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独特定位、运作和功能等问题。我以为，此等思考与实践，对我们国家在新时期全球化进程中建设“文化大国”命题，有着沉甸甸的意义。

深圳这个城市，物质诱惑无处不在；而宏海则固守着文化这一相对寂寞和清

贫的岗位，从点点滴滴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始，将自己的智慧魅力传达，其责任感、使命感和敬业精神令人钦佩。读宏海近30年关于深圳文化研究的文章，读到他“舍我其谁”的一种“在场感”，既印迹深刻，又倍感亲切。宏海的学术论著，始终在关注深圳乃至当代中国文化的未来，以及如何将文化未来图景的理论设想实践于深圳文化历史和现实的研究之中。可以说，这座城市短短30年的“文化史”历程，为宏海个人所持的学术规范化、本土化以及创造性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与素材，反之，宏海此种经验与研究，又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之路提供了可贵的理论实践。

深圳文化界曾讨论过不少问题，从“沙漠论”到“绿洲论”，从“现代文化名城”到“文化立市”、“高品位文化城市”，从“活的文化、新的传统”到“深圳学派”的想象……无不涉及深圳城市文化发展的重大方向，惜皆未深入；且各问题之间也未能建立起理论上的内在关联，最终在理论上无法形成“深圳文化”的问题意识以及研究系统：无论是泛泛地为深圳文化辩护，或急切地为“新文化传统”的生成命名；无论是在经济发展之后对文化支撑的强烈诉求，或是迫不及待地欲与主流学术话语接轨，一旦谈及“深圳文化”，要么理论或缺，要么对外来理论不加思辨地运用，这是我所见“深圳文化”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基于此，宏海与他的这本专著《我与深圳文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本土文化研究”的范本。此之谓“本土”，与其说是一个实存客体或一种“民粹主义”立场，不如说他首先意味着一种知识的“态度”，是知识分子（或某类特定的知识分子）与现实发生关联的方式；与过往单纯将“本土”作为予取予求的“矿藏”或“批判靶子”所差异者，此之谓“本土”，意指我们的研究与视野必须同步“左右”：其左，是“普世”之西方理论体系；其右，是中国（深圳）所面临的独特经验。既不能僵化地从西方的理论出发，刻板地寻求中国经验、素材以相应和；更绝不可因了中国当下独特的经验，而陷入以“我”为尊的境地。基于“本土”态度，我们提倡首先对自己的问题作扎扎实实的研究，立足其上提炼、形成有理有据、得体得法的研究体系与方法。而我观宏海以及宏海此专著，恰在此宏大命题上，率开先河。

深圳已到了可堪建构“城市文化史”的阶段。日前，从深圳宣传文化部门到大学研究机构，呼吁建立“深圳学派”者不在少数。从积极意义上，此种吁求体现出深圳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学术自觉，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文化必然”；但学派的形成，必须有特定的学术梯队、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以及由之而生的学术思想成果。显然，深圳并无自己的优长学科，没有健全的学

术梯队，缺乏足以代表这座城市学术精神的“大师”和有分量的学术精品。所谓“深圳学派”，目前尚只能称之为远景、愿景。但我很乐观地接受这一学术流派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因为宏海。作为深圳“城市文化史”的代言者，特区学术“本土化”钻研的重要人物，宏海其人，其专著，对中国文化、学术范畴间“深圳学派”的建构，从方法、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等多个角度看，均堪称有开创性贡献。而在深圳“本土”理论饥渴、文化自觉初步觉醒的当下，《我与深圳文化》此部“极接地气”的佳作，更似“乳燕初声”，带给这个城市满心喜悦。我更有信心期待“深圳文化”更灿烂的明天；且我有一千个理由相信，宏海亦必然在他酷爱、深耕的文化学术领域，“百尺竿头”，推陈出新，实现他身为主流知识分子，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对人生独有的价值。

（2010年12月30日于广州东山，作者系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山大学客座教授、编审）

序二：

立足本土原创的文化实践

胡经之

2010年，深圳正式步入30周岁。这个南中国新崛起的城市不光在经济建设方面创造了奇迹，在文化建设方面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全国大城市“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深圳位列榜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授深圳“设计之都”称号，此系全球第6个获此殊荣的城市；音乐厅、图书馆、中心书城、美术馆、大剧院等媲美全国的文化硬件鳞次栉比；文博会、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创意12月、社科普及周、国际钢琴协奏曲大赛，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文学艺术创作，成绩斐然；文化产业发展异军突起；时至今日，深圳的确成为岭南名副其实的“新文化重镇”。

遥想特区创建之初，曾有“文化沙漠”之称，所幸深圳丝毫未曾屈从于此等说辞，30年来始终不懈努力，终于使这座城市的文化蔚为壮观、成果非凡。因此，在特区“而立”之年，作为特区文化建设先行者之一，我非常乐意读到关于这座年轻城市“文化编年史”一类的研究读本。而拿在手边的《我与深圳文化》皇皇两大册，正是深圳文化学者杨宏海刚刚脱稿的新著。此书从“单个人”的视角透视深圳30年文化的历史变迁；将个体文化实践与一座城市30年的文化发展相关联；以一个人学术研究、艺术创作的历程，见证与展示这座城市30年的文化发展轨迹，确为盘点与回眸深圳文化30年的一个新颖视角。

“一个人眼中的深圳文化”，看似简单，实则不然。首先，此“人”必须要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眼”；其二，此“人”与“深圳文化”，需得血

脉相连。宏海调入深圳时间早，属于特区文化“场”的主要开拓者；谈及深圳30年文化史上许多标志性文化事件，都绕不开杨宏海；如“特区文化”、“打工文学”、“现代文化名城”、“文化产业”、“深圳精神”、“深圳文化大讨论”、“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新客家文化”、“阳光写作”等等。所以，杨宏海的《我与深圳文化》，从框架与粗线条上正是深圳文化这30年来的律动与变迁的写照。

宏海在深圳工作的26年，是深圳文化发展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他以一人之身，既成为深圳文化30年文化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人与主要参与者、实践者，还是深圳许多重要文化活动、文化品牌的策划者、驱动者，更是30年深圳文化现象与文化理论的研究家，数种身份集于一身；正因如此，洋洋百万言的这部《我与深圳文化》具有深圳文化史上的“史学意义”和“典型意义”。书稿集宏海26年研究深圳文化现象文章之大成，从文化理论与文艺创作两方面为构筑深圳文化大厦添砖加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我于“知天命”之年南迁深圳。宏海则于1985年移居于此，晚我一年；此前，他在家乡梅州的一所高校任教。宏海是客家人，客家文化传统向来“崇文重教”，注重“诗礼传家”；他的父亲杨冀岳先生就是一位学养颇深的古典文学学者、诗人；受家庭熏陶，饱读诗书的宏海极富人文情怀与研究视野，为深圳市文化局所看重，宏海应聘而来，因之结缘特区。

宏海来深圳之时，特区虽然已经开创5年，但特区文化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深圳市文化部门希冀从理论研究开始，寻求深圳文化发展的方向与道路；历史的机遇就这样落在宏海身上；自此，他的生命便与深圳特区这片热土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宏海对于“特区文化”所发出的第一声，是他的首篇论文《深圳，呼唤特区文化“特”起来》，此文在全国文化事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交流，引起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的关注与有关专家好评。自此，他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深圳特区文化的特点及发展走向》、《深圳观念文化的精神解读》、《深圳建成现代化名城的目标选择》、《香港回归与文化引桥》等系列学术论文，从文化理论的高度，赋予特区文化以美学内涵，全方位探讨特区文化的重大理论课题。他还热情参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展开的关于深圳文化的大讨论，发表《深圳文化解忧录》、《文化深圳的大众广场》，为在摸索前进的中深圳文化答疑解惑。

上世纪90年代初，宏海受命与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合作，创办中国第一家“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获任为第一任中心主任后，宏海更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于

特区文化研究事业。他多次奔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高校，选挑优秀人才，开始一草一木的搭建、一兵一卒的招揽；一批全国优秀的博士、硕士，在他的带领下，深入特区参与深圳文化实践，探讨、总结、构建理论体系；并以理论引导深圳文化的发展方向。比如，宏海最早带领“中心”的研究人员对华侨城旅游文化产业进行实地考察、专题调研，率先总结该企业“文化+旅游”的先进经验，并由点及面，对特区整体文化产业展开研究。1992年，他写出《关于深圳文化产业的调查与思考》，是特区第一篇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论文，可视为深圳在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其后文化产业成为“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体研究方向，成为深圳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宏海功不可没。

《我与深圳文化》是宏海对自己26年特区文化研究的总结与回顾，全书分为9部分，囊括了他在深圳从事文化研究、文艺创作的9个重要层面。书中首章对特区文化的相关论述，堪称其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

宏海在国内率先展开对“特区文化”这一新型文化领域的研究，卓有建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即出版《文化深圳》理论专著，对深圳领先于全国的观念文化、广场文化、企业文化、新民俗文化以及挖掘深圳人文历史资源等多方面，都予以了充分关注与深入探究。他指出，深圳文化兼融岭南文化传统与新兴移民城市性格，更因特区身系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具“窗口”、“引桥”等特殊文化特征，发展出独树一帜的融汇型多元文化。

2010年上海世博会，深圳以“中国梦想试验场”命名自身展区；这一观念，恰恰验证了宏海26年间特区文化研究的总体方向。深圳这一“试验场”的特殊身份，在广东建设文化强省与深圳“文化立市”的总体格局中，成就出尤为生动的文化思考与实践。而宏海潜心探究的深圳特区文化课题，需得融合政府视野与学术功力，属于严谨的体制内文化研究。

正因如此，宏海主持的“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自觉地成为政府文化行为的组成部分，成为政府文化部门的“智囊团”；“研究中心”许多文化研究成果，直接为政府文化部门采纳，而列入政纲，予以实施。如其率先提出将深圳建为“现代文化名城”，为市委、市政府采纳，在当年的深圳文化工作会上，由市领导正式提出并列入发展规划；他参与创办“深圳读书月”，参与策划“市民文化大讲堂”，举行“深圳人文精神大讨论”等等，都体现出宏海热心深圳文化发展、积极参与文化实践的火热激情。

宏海对特区文化的痴情与坚守，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对“打工文学”与“客家文化”的持久关注与研究，这是他文化研究成果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板块。

宏海最早提出“打工文学”概念，切实关注外来劳务工的精神生活，为实现外来工的文化权利鼓掌欢呼。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打工文学”成为深圳文化风景中的亮丽品牌：成功举办了6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编辑出版《打工世界：青春的涌动》、《打工文学纵横谈》、《打工文学备忘录》、《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等相关著作；为提升“打工作家”文学修养而举办多种文学培训班；组织体制外作家到海外考察，拓宽其视野……可谓成果斐然。

身为客家人，宏海对客家文化研究也自成一统。他从“粤东客”的独有民俗着手，对深圳的民间歌谣、客家民居所蕴含的移民文化特征进行了全新的文化阐释；他认为，应当让中华精神的支脉——客家精神赓续绵延，薪火相传。对客家文化个案，如“黄遵宪与民俗学”、“丘逢甲的军事思想”、张资平、李金发等小说家与诗人，宏海更是悉心研究，编纂《深圳民间歌谣》、《客家诗文》、《客家艺韵》等著作；宏海在深圳创办“客家文化节”，并融入每年的“创意12月”，让传统客家文化刮起创意旋风，深得各界好评，渐成深圳文化的一大亮点。因其对客家文化精深钻研及其实绩，作为名家工作室之一的“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喜获挂牌，我深信，他在客家文化领域更丰硕的成果，指日可期。

杨宏海对深圳校园文学的关注，也有目共睹。对中国青春文学的开山之作——郁秀的《花季雨季》，宏海最早予以扶持，并敏锐地发现这一作品“深圳制造”的文化标识意义与鲜明特色。他与市教育部门联袂发起创办全国第一个“中学生文联”，打造“阳光写作”，为特区青春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支持与美学引导的土壤，让其融入城市人文精神建设之中，经他呵护、扶持过的深圳青春文学写手，如郁秀、妞妞、张悉妮、韩淑娴、袁博、赵荔、李墨白、李梦、陈静等，都在文学创作上有可喜的收获；对全市中学生文学社团和校园文学创作，他肯定其为“植根热土的文学新苗”，认为深圳乃孕育“青春文学”的热土，要让“阳光写作”照亮莘莘学子的内心世界；宏海通过与著名作家曹文轩、评论家白烨等人的学术对话，初步建构出“阳光写作”的理论形态，被誉为“阳光写作与生态阅读的理论旗手”。

阅读与写作，属“一母同胞”。作为深圳市中学生文联的名誉主席，宏海在推动“阳光写作”的同时，亦关注特区青少年的生态阅读；将富有人文意义的文学活动延伸到中学校园，多次在翠园中学、育才中学、红岭中学等校组织参与“图书漂流”与“当代作家与中学生面对面”等活动；指导中学生文联组织“深圳读书人群大型调查”、“深圳市中学生读书状况调查”、“深圳市外来青工读

书调查”；开展“深圳青春文学季”等富有创意的人文教育活动；又在改革开放28周年之际，指导编辑推出“深圳青春文学精品工程”，为中学生素质教育创造良好的氛围；他还与中国作协创研部联合举办“首届全国未成年人阅读文化论坛”，倡导审美、人文、经典、符合青少年特点的阅读形式，使之成为未成年人读书与成长的精神家园。文博会期间，宏海还邀请英国创意大师霍金斯来深，参加“青春写作与创意未来”论坛，让创意大师与创意少年对话，被誉为一时佳话。

中国当代文学是宏海施教时的“老本行”。来到深圳，他亦未放弃关注当下深圳文学创作现状。他认为，深圳文学开放式的“窗口”特点，折射出青春城市的文化景观，具有独到魅力。如在第二章《都市百态——移民新城的文学景观》专辑中，既收有对市场经济背景下深圳文学发展的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与深圳文学》，也有相关深圳文学发展的学术对话，如他提出深圳文学要抒写变革时代的精神史，同时又对都市文学、特区文学的品格与深圳网络文学发展、深圳与港台文学艺术交流等，都展开了详细的文化阐释；对深圳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如陈国凯、李兰妮、杨黎光、林雨纯、彭名燕、杨争光、曹征路、李亚威、丁力、谢宏、厚圃等作家作品，均有细致的点评与研究。宏海文学评论善于结合作品从大处着眼，微观透视，往往有独到见解，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2001年冬，宏海调入深圳市文联，担任专职副主席，分管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这一时期，他丝毫未放弃理论研究，著有大量篇章。难能可贵的是，宏海同时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将创作、研究和表演才华结合起来，创作了不少舞台艺术作品，收入本书第七章的《月照围楼——文化学者的诗意情怀》专辑中，就反映出宏海艺术创作上的天赋与成果。比如，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之际，他与著名导演熊源伟、著名舞蹈家岳世界等人合作编写了《祖国，深圳对您说》的大型歌舞剧，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在深圳特区30周年华诞前夕，他执笔创作了客家风情歌舞剧《月照围楼》，与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联袂，将之搬上舞台，获得各方好评，《文艺报》整版评论谓其为一部融音、舞、诗、画等要素为一体的客家风情歌舞剧：以“月亮”与“围楼”为意象，以“创新原生态”的艺术形式，通过主人公阿楼与月儿由少而老的人生经历的这根红线，串起客家文化中的颗颗珍珠，全面展现了客家人热爱生活、质朴热情的民风与不惧磨难、坚韧拼搏的精神，称得上一部“深圳原创舞台精品”。此外，宏海还创作了《土楼回响》（配乐诗朗诵）、《中华儿女共婵娟》（情景歌舞）、《民族精神传万年》（表演唱）等客家文艺节目。

30年以来，特区人不辱使命，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敢闯敢干的创新气概，一往无前，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排头兵”开拓、示范、辐射的重要作用。“三十而立”，深圳特区已经告别了稚嫩的童年与青年时期，开始步入人生的中年，性格渐趋成熟，自身城市风格开始成型；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深圳需要承前启后的理论研究，需要薪火相传的文化脉系。杨宏海的文化深圳之路，既圆满地完成了深圳“前30年”的“理论拓荒”，又为“后30年”特区文化的探索创新开道首航。《我与深圳文化》在对这座城市文化经纬的生动论述间，让人回味略带青涩却光彩夺目的深圳文化之燃情岁月，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作者与深圳特区文化的血脉相连。

宏海曾就学于我，在读研究生时，他就非常注重贴近现实，搜集整理各类资料，并且在学术研究中活用资料，对此我甚为赞赏。综观全书可以看到，宏海的文化研究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立足本土与原创，活用翔实而鲜活资料，与深圳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将个人的文化实践融入城市文化的发展过程之中，具有很大程度的探索与创新的色彩。从宏海的身上可以看到，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吸引了众多的文化人才，而众多的文化人才又在这座城市里实现了人生价值，这也正是深圳这座城市最动人之处。相信读者在阅读这部内容繁富的著作时，可以从宏海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探索中，感受到他那“文化深圳”的理想情怀，从而展开文化想象力的双翼，去迎接未来30年的激情岁月，去构筑这座移民城市的精神家园。

2010年11月26日于望海书斋

（作者为著名文艺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深圳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美学学会会长、深圳市作协主席）



序 一：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 / 黄树森	1
序 二：立足本土原创的文化实践 / 胡经之	8
第一章 文化深圳——“特区文化”的前世今生	1
【自叙】寻梦特区：为构筑城市文化大厦添砖加瓦	3
深圳，呼唤特区文化“特”起来	10
特区文化：概念由来、问题意识及研究之路	22
深圳特区文化的特点及发展走向	41
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	49
深圳广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63
开拓文化绿洲	
——深圳特区十年文化建设纪实	73
深圳建设“现代文化名城”的目标选择	81
再议将深圳建成“现代文化名城”	90
从深圳看岭南新文化的萌生和发展	97
深圳与海洋文化	110
深圳移民文化的广阔发展空间	120
移民新城的民间文艺	124
应当重视挖掘深圳人文历史资源	132
深圳文化解忧录	140
文化深圳的大众广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创刊百期述评	152